

回國升學記

夏芸伯著

再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

亞洲出版社



記學升國回

著伯芸夏

版出社版出洲亞



「同國升學」記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全一冊基本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著者：

夏亞芸

出版者：

亞洲出版社

承排者

永興排字所

印刷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八十八號
香港蓮花宮西街五號四樓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再版

本書是一個典型的香港青年「回國升學」的現身說法，同時也是最近千百海外青年僑胞投向紅色中國而感到悲觀失望的寫照。在這裡可以看到中共誘騙青年的各式花樣，可以聽到中共傳聲筒的種種謊言，也可以見到中共所謂「照顧華僑」的空頭支票。

由於作者只是一個尚在求學中的青年，正如他所述：沒有高深的寫作技巧，更不懂得渲染與誇張。而我們也願意全部儘量地保留他的「真實感」，初時如何傾慕中共的「德政」，及後又如何發現中共的偽裝，由頌揚以至鄙棄，一切均隨其親歷身受的自然進展。越是樸素粗糙，愈見其坦率真純；所以，祇要這本書有助於嚮往赤色教育的求學青年們的參考觀摩，也就有了刊行本書的價值了。

前 · 言

在敘述我的「回國升學」記之前，有些話是要在這裡說一說的。首先，我得申明一下，我只是一個極平凡的學生，並沒有高度的寫作技術；因此，我的這篇文字，也只是一種普通的報道。不過，在這裡，我們却確定了一件重要的事實：我們青年人易受其迷惑的共產黨是一個殺人的集團，它不但不造福於國家人民，甚至禍國殃民；這一點我自己親身體驗過，自信是十分正確的。我本來是一個好學而純潔無染的學生，然而，這些年來受了中共的迷人的宣傳，竟然跟上了它，開始作「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最後還抱着滿腔熱情「回國升學」去，「投進偉大祖國的懷抱」。百聞不如一見，我甫抵所謂「人民的廣州」，便發覺中共的所為與它所說的大相矛盾；我更目擊它的對付人民的殘酷手段，在「五反」期間那種空前的慘劇，不但令人毛骨悚然，甚至最溫和的人也發生憤恨。我為着使港澳及海外的千萬學生勿步我的後塵，投身虎口，遂不慚幼稚地寫出這一部東西。

我對共產黨本無若何成見，諸君從我後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來的；我之所以痛恨共產黨，是在我回到廣州以後，眼見中共的殘酷黨性而產生的本能感情。設身處地，諸君若有機會往廣州跑一趟，想當有與我相同的感覺，這一點是可以預知的。

我的痛恨共產黨，可以分兩方面來說：首先、它破壞了我的溫暖的家庭，奪去了我的美好的前途，

使我今天淪爲海角的流浪者；其次、中共引狼入室，把俄國人奉若神明，來統治甚至奴役我國同胞，掠奪我國豐富的礦藏，榨盡農民每一滴血汗。更嚴重的是中共對僑眷的壓迫和殘殺，大陸僑眷死的死了，僑眷能够苟延殘喘的，也在高壓下，被軋得像榨糖機下的甘蔗。

在我敘述的正文中，我沒有強烈的抨擊中共，我只將我的經歷和盤托出；是非皂白，聰明的讀者自能判斷，我素來相信讀者是最客觀的尺度。

夏芸伯・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於香港

亞洲出版社即將出版新書

文學創作 ·

南的憂鬱

名 謠

馬 岳

彬 著

者

教授的赤戀

江淮李招

河魂 棘火 曲

王純如著

楊瑞明著

著

趙慰慈

著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
二元
二元

定價港幣

專題研究 ·

第三國際興亡史

鄭學稼著

二元五角
定價港幣

目 次

前言	一
重返香港	一
我怎樣進了「進步學校」	一
美國不值得去	一
我們怎樣學習「文件」	一
圍繞着升學問題	一
回到「祖國」的懷抱	一
澆上一盤冷水	一
投考亞偉速記學校	一

九

到了嚮往的「北京」

五二

十

只上了一天的課

六二

十一

天下烏鵲一般黑

七三

十二

北平——上海——廣州

八二

十三

全是紙上文章

八九

十四

一個不要母親的女兒

九九

十五

找保証人傷透腦筋

一〇三

十六

如此這般的照顧華僑

一〇九

十七

半公開的買賣

一一六

十八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一三〇

一 重返香港

一個烈日之下的晌午，時間在十二點半左右，一列火車從廣州開抵深圳；這一天的旅客很擁擠，估計它的數目大概超過一千人，其中大多數是老弱婦孺，在這中間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四邑（台山、開平、新會、恩平）出廣州再往香港去的，我是其中的一個旅客。

從早上八點半上車，經過整個上午的幾個鐘頭的顛簸，我感覺十分困倦。我帶着疲乏的身軀，跟全部旅客一起排隊等候檢查出深圳站。因為一般旅客經不起烈日的蒸晒，放棄排隊，跑到有蔭的地方去躲避，讓人疏了的時候，再行前進；我自己雖然身子已經很疲乏，但我極想快點通過檢查，出閘門入羅湖，所以我乘着這個很難得的良機，爭取到前排的位置。

深圳站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旅客檢查站」，面積很狹小，却容納了四個機構：「邊防局辦事處」，「海關檢查處」，「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辦事處」，這四個辦事處並列在一邊，開了幾個窗口以檢查旅客。首先是受邊防局公安員的檢查，那是個北方人，他盤問得很深入和詳細。他收了我的通行證才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答道：「夏芸伯。」

他跟着問下去：「在那兒讀書？」

——「北京亞偉速記學校函授部。」

「校長是誰？」

——「唐亞偉。」

「系主任呢？」

——「我們學校沒有系，只有班。班主任我不曉得是誰。」

「你在那兒讀書怎麼不曉得？」

——「我是在函授部。」

「教務主任有沒有？是誰？」

——「陳新。」

「你到了香港還回來嗎？」

——「當然回來啦，因為我的通行證是雙程的。」

他問了這些話，然後把通行證從頭至尾再看了一遍，尤其注意公安局所蓋的鋼印；看完了才交回我。

第二處窗口是向海關登記所有貴重物品：手錶，墨水筆，金器等都在登記之列。經登記的物品，海關人員在通行證底面一一註明。據說這措施是在防止走私。負責登記的關員，年紀約在三十五歲左右，

他拿着我的手錶（我原帶有兩個手錶赴穗，在穗逗留期間因生活困難，就賣掉其中一個。）和墨水筆很注意的觀察了好半天，纔問道：

「你這個手錶是日曆兼游泳錶？」

——「是。」我說。

「買來的時候值多少錢？」

——「五十元。」

「我就不相信！一個日曆只值五十元？」

——「你不相信就難說。九龍好幾家銀行就是這個價錢。」

他說的一口地道廣東話，大概是廣東人吧。他把我的手錶脫下來，詳細地記下了錶廠，錶型等項，然後擦開我的墨水筆，看了看，問道：

「這是那一家廠的出品？」

這時我已經覺得不耐煩，便沒精打采，懶洋洋的答道：「派克升一型。」

於是他又把筆名登記起來。這一項登記手續，竟花了十多分鐘的時間。

我因為沒帶有「人民幣」或銀行存摺這類東西，不用向「人民銀行辦事處」登記。「中國銀行辦事處」則係負責賣港幣，而我早在廣州時，已向「中行」買了被限定的十元港幣做旅費，所以也不用再買，而且也不准再買。

再經「海關」最後的翻箱倒篋的檢查，出口手續便算辦妥。負責檢查我的行李的職員，也是北方人，並且也學習過速記，我便用普通話跟他談起速記學術來，我們的談話居然很投機；他把我的行李畧畧一看，便劃了號放行。

可是我心裡還在恐懼，半年來受够了可怕的遭遇，要是這最後一關溜不過，那以後的情形是不堪設想的。這恐懼的心情，直至進入羅湖，上了開往九龍的火車時，才輕鬆下去。

當我從早上在大沙頭站上車的時候，還穿着大衣，直到深圳時，竟完全不知道冷熱，但上了羅湖的火車以後，却脫下大衣還覺得很熱。這是精神從緊張到平靜的原因。

火車向九龍跑去，田野、高山、樹木、這些景物，不斷的往後掉。長空很晴朗，青青的天，白白的雲，給我以一個爽朗的印象。

爲了方便，我坐的是二等車。同車的人，看各樣報紙的都有；這使我猛然意識到這裡已經是自由的世界，在深圳河以北，這情況是沒有的。我屈指一算，沒有看到香港報紙，已是九個月的長時間了。我立刻買了一份晚報看。

報上載着英國探險家攀登額菲爾士峯的消息，說英國人用這點偉大的成就，來迎接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的加冕禮。這一個探險隊，是經歷了千辛萬苦，受盡艱險，才得到今天的成就；他們的動機，無非是探察大自然的秘密，給地理科學提供一點貢獻。想到我自己，也經歷過了一番艱險，我最初的目的，是向着幸福和真理追求，曾幾何時，飽歷人爲的驚險，幾經掙扎，才從深淵中拔身出來；結果，不但幸

福沒有追求到，連既有的幸福都喪失了。但是我却找到了一點真理：我所擁戴的共產黨，原來是一個殺人集團，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地區，原來是一個恐怖世界。我能够從險惡的環境中跳出來，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

火車在急速的奔馳，發出那有節拍的聲音，聽起來也比較在深圳以前所聽到的悅耳得多。清風徐徐吹來，使疲倦的我，朦朧的打着睪睡。忽然來了一個急喘的氣笛聲，這一聲長鳴，把我從微微的夢境中驚醒，睜起眼睛一看，發覺火車已抵達尖沙咀車站，我又看見了一別九個餘月的半島酒店大廈。

我拖着兩件行李步出車站，但給等候接車的許多人擁得水洩不通，這些人都是前來迎接他們從大陸來的親友，一個個露着焦急的神氣。他們見我是跑在最後的一個，便圍着我很失望地問道：

「深圳那邊的旅客都跑光了嗎？」

「留在深圳未檢查完的還有多少？」

「檢查得嚴不嚴？」

「有沒有不准入境的？」

這樣的問題，你一句我一句的，紛紛纏綿，使我應接不暇，我綜合地答覆他們：「還有好多人逗留深圳，因為檢查手續麻煩，趕不及這一班車。入境倒是容易的，只要他們是廣東人，外省籍的可就要費些唇舌了。」

我很明白他們的心情，自己的親友能夠逃出大陸的虎口，總是一個安慰。我正這樣的想着，有人迎

面向我打了個招呼：「老夏！」啊！原來是明生來接車。

「你等了很久是不是？」我本能地放下行李，握着明生的手，看樣子，他是很高興的。我們來不及寒暄，他抽着我的箱子拉着我迅速地出了車站，一招手，便駛來一輛「的士」，我們就這樣輕快地到達明生的家裡。使我想起在廣州、漢口、北平、上海那些下車時的狼狽與驚惶。

明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待我蠻好，像同胞兄弟一樣。他今年是一十六歲，但人却生得很蒼老的樣子；現在還是在彌敦道一家百貨公司裡工作。他早就曉得我是今天回香港來，特地向公司請假到尖沙咀接我。

「相隔已有九個月之久了，時間過得很快。」明生和我並坐在車子裡，他挪近我身邊拉着我的左手，話說得很慢：「你申請回港經過很艱難的過程是不？」

「我在兩個月以前就申請，你是知道的，直至昨天才批准。現在是一身懶快了。」我說。這時車子駛過佐敦道，我們在座位上拋了一下，打斷了我的話。

「嘩，你這九個月在大陸的所見所聞一定很多，從你的一些來信便可知道；要寫起來，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冊子啦。」明生帶點天真的說：「真的，如果願意做，這件事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香港和外埠許多青年學生還很嚮往大陸，把你親身經歷的情況告訴他們，不是可以提起他們的警覺嗎？」

「這件事情本身雖然很有意義，可是我的文筆低劣，怎麼行？」我很坦率地說。

「說那裡話，你是學過文學、寫過小說的，怎麼還怕這個？我看，只要你用心寫，那是不成問題

的。」明生對這事似乎很熱心。

「以後再說吧。」一路上我們就是這樣談着；車子很快的駛到黃明生的寓所停下來。這是在大埔道香江中學對開的地方，明生在這兒一直住了四年的光景；他是住的三樓後座一個房子裡，房子本來不大寬，只因他的家具不很多，所以倒不覺得怎麼小。

這以後我便在他那裡住下去。他仍是個單身漢，所以他工餘很有空暇跟我聊天，我們的談話漫無邊際，拉東扯西。他最愛問我在大陸的見聞，我也很高興談這個。有時候談起共產黨的幼稚行爲，我們便大笑一場。但說到它們的暴政，明生的青筋却又一條條的漲起了。

我住在明生處，他白天上班，留着我在樓裡，我除了翻出他的藏書看看之外，餘下來的時間，便斷續續的寫起我這「回國升學」的故事來。

二 我怎樣進了「進步學校」

一九四九年春，國共和談破裂後，「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畧取南京；接着，勢如破竹的佔領無錫、蘇州，攻破上海防線。在華中方面，林彪所部第四野戰軍，在奪取了武漢、長沙、衡陽之後，長驅直進，粵北防線，不攻而破，「解放」廣州，指日可達。

這時，我正在黃花崗畔的文化大學讀書，唸的是新聞系，我那時才不過十八歲。許多人說共產黨很兇狠，而潛伏在學校裡的左傾份子則說共產黨如何如何的「偉大」「開明」，我却疑信參半；不過，在那些日子裡，自己只知道怎樣讀書，尋求學問，我在某一天的日記裡曾經這樣寫過：

「……林近來很喜歡和我接觸，而接觸的時候，又往往談到政治問題。他問我共產黨好不好；這一問未免太突兀。對於共產黨的政策，我向來沒有研究過，那裡能够判斷它好或壞？林平時和一些左傾人物過往很密，經常託人從香港帶文匯報回來看；綜合一切，我發生懷疑：『他是不是參加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這時我已微微的聽到一點消息，共產黨早已在我們學校裡秘密組織了地下學聯，快要搞風搞雨了。尤其是秦元邦這個人，思想更為左傾，看來他似是地下學聯的領導者呢。……有幾位同學要我參加什麼讀書會，我沒有答應；那個組織一定又是共產黨份子搞的了。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高興談政治、搞活動；我們來到『文大』是爲着求學，何必參加政治活動？我自己認爲，國民